

# 当代译苑的恒久之光

## ——追忆一代宗师奈达

谭载喜 香港浸会大学

一代译学大师尤金·奈达（Eugene Nida）2011年8月25日与世长辞，这是译学领域一个令人痛惜的消息。消息从笔者的欧洲友人、从纽约奈达圣经学术研究所、从多个国际译学研究网络等渠道同时传来，笔者深感悲痛。三十多年来大师对笔者那亦师亦友的音容笑貌，顿时浮现脑海，从最初结识大师，到请益大师，再到接待大师到访、与大师促膝交流，那一幕一幕，无不勾起笔者对往事的回忆和对大师的深深怀念。痛惜之余，笔者愿将耳濡目染中的大师为学为人和我们如何认知翻译、析解译学的点滴，书写于此，以寄托对大师的哀悼之情。

### 一、初识大师 知认译学之途

记忆之神首先将笔者带到32年之前的伦敦。那是1979年雪融春暖的三月，中伦敦理工大学（现名西敏寺大学）现代语言学院的一场翻译讲座，由时任该院院长的彼得·纽马克（Peter Newmark）教授主持，主讲嘉宾为美国圣经公会译学专家尤金·奈达。当时留学该校研读语言学、且自小热爱翻译的笔者，无疑就成了听课的学生之一。虽然在国内大学所修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其中英语精读课程包括了翻译实践的内容，另外学校间或也会提供一、二个翻译讲座，但实践也好讲座也罢，当时在国内这类涉及翻译的课程，都基本属于翻译实践课的范畴，学的是某个句子、某段文字怎么译，讲的也是这个句子、这个段落怎么译或应当怎么译，理论部分一般会提一提严复，谈一谈信达雅，但最终又会再回到怎么译或应当怎么译。因此，那一次在中伦敦理工大学进行的翻译讲座，不仅成了笔者第一次聆听到的奈达讲座，同时也是第一次聆听到的、不同于此前在国内所能听到的翻译讲座，其理论性、学术性，别具一格。正是那次非同一般的讲座，将笔者带入当代翻译和译学研究的海洋，奈达这个名字也从此进入笔者的研究视野，成了将笔者导向现代译学领域的引路之光。

或许是由于奈达自小就是一位能言善辩的演讲天才，中学期间还曾获得过加州南部地区辩论大赛的冠军（这是笔者后来开始研究奈达时才了解到的），又或许是他虔诚研究圣经和经文翻译以及如何将所学之道传播给他人的背景使然，奈达的演讲术是超一流的。长约一个半小时的演讲，从翻译的性质，到翻译中语言意义的各个层面和维度，再到翻译过程的四个基本步骤，他都由浅入深，由简至繁，娓娓道来。讲话中，他遣词造句十分考究，声音洪亮、铿锵有力，音调标准、动听，还不时夹插一些幽默小故事，配以各种恰到好处的身体语言和动作。记得当时前来听讲的老师和同学很多，把那能容纳

一百多人的演讲大厅挤得个水泄不通。讲台上讲述的，是一个关于翻译的严肃的学术话题，但讲者幽默而生动，不时引发全场会心的笑声——在后来的 30 来年中，笔者有机会多次聆听奈达博士的各种讲座，发现这正是他的演讲特色：他对所讲内容的阐释是如此之透彻，又是如此之通俗易懂，从来都不会让听众对看似枯燥的话题感到乏味。

当时，笔者作为中国留学生，从刚刚开始对外开放的土地而来，由于国内的长期封闭，对包括翻译研究在内的国外学术发展动态，也包括早已名震海外的奈达本人及其译学思想，自是全然不知或知之甚少。因而，奈达在台前所讲的一切，基本上都是笔者以前不曾听闻、不曾接触过的，属于全新的知识范围而极富吸引力，再加上讲者释放出的那种谈笑风生、睿智幽默，更令笔者如沐春风，自始至终都浸淫在探求到了真知般的亢奋中。

对于笔者的这段经历，奈达生前同事斯泰恩博士（Philip C. Stine）在他 2004 年出版的奈达传记<sup>1</sup>中做了如下记载：“1978 年<sup>2</sup>，有一位中国留学生，名叫谭载喜，来自湖南，在英国埃克塞特大学（Exeter University）就读。他在伦敦听了奈达演讲，并在演讲结束后与奈达见面。这次演讲和他与奈达的讨论引起了谭载喜对翻译的兴趣，亦激发他研究翻译”……“由于谭载喜与奈达交往，中国的学术界甚至在《奈达论翻译》（笔者所编）这本书出版之前，就已经听过奈达的名字和奈达所做的工作。”<sup>3</sup>（黄锡木，2007:226）

可以说，笔者对奈达深感知遇之恩，对这段相知大师于英伦的经历，倍感珍惜，没齿不忘。

## 二、请益大师 析解译论之道

再回到前面提到的奈达伦敦演讲。虽然那是 30 多年前的事情，但笔者至今仍旧清晰记得当时的情景：演讲中的几个关键词，醒目地书写在台前的白板上，也从此深深地烙印在了笔者的脑海中：the science of translating（翻译科学）、dynamic equivalence（动态对等）、reader reaction（读者反应）、designative meaning（指称意义）、connotative meaning（内涵意义）、kernel sentence transfer（核心句转换）、analysis – transfer – restructuring – testing（分析—转语—重组—检验）。

---

<sup>1</sup> 传记作者及标题为：Stine, Philip C. 2004. *Let the Words Be Written: The Lasting Influence of Eugene A. Nida*. Atlanta: Society of Biblical Literature. 于 2007 年出版中文翻译本，名为《文以载道—奈达对圣经翻译的贡献》，黄锡木编译，香港道风书社出版。

<sup>2</sup> 此处时间应是指笔者留学英国的第一年，如文中所述，笔者于伦敦听奈达讲座的时间为 1979 年，当时就读的学校是中伦敦理工大学（即现在的伦敦西敏寺大学），至于随后提到的埃克塞特大学，这是笔者留英第三年期间去的学校。

<sup>3</sup> 本段引文的原文为：“In 1978 Tan Zaixi, a student from central China studying at Exeter in England, attended a lecture Eugene Nida gave in London and met with him afterward. This lecture and discussion piqued Tan’s interest in translation and stimulated his research and reading.”...“Even prior to the book’s [*Nida on Translation* or 《奈达论翻译》], Nida’s association with Tan helped give Nida’s name and work exposure in China.” (Stine, 2004: 135)

这些词语以及它们所代表的概念和意义，其实都出自奈达本人于 1964 年发表的代表作 *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翻译科学探索》）以及 1969 年他与塔伯（Charles Taber）合著的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翻译理论与实践》）。奈达在他的演讲中，主要是以这些概念为主轴，对他所认知的翻译、翻译性质、翻译过程和翻译中所涉及的诸多问题展开进一步的讨论。当然，在相隔 30 多年的今天，即使在华文地区，这些词语和概念，也都早已为人耳熟能详，笔者无意、也无必要把当时听到的奈达本人的阐释一一重述一遍。然而，其中有 3 个概念，笔者认为构成奈达翻译思想的最核心概念，即“翻译科学”、“动态对等”和“读者反应”，并且由于它们在国内曾经引起过这样或那样的阐释和争议，而此前笔者未曾以论文的形式就争议问题来发表意见，仅在向学生讲述奈达翻译理论和思想的课堂里，或与译界同仁交流译学心得的学术会议上谈论过本人看法，因此笔者愿借撰写本文追忆奈达的机会，来对这 3 个核心概念作一些重点回顾和思考。讨论的目的，不是为了求得国人在对奈达翻译思想的认识上或对他某些概念的翻译上达成一致（这样做并不现实，也无必要，因为对于奈达或对于任何公众人物的作品和思想概念，不同读者、受众会有不同认识、解读，彼此不必强加各自的观点，不必硬求认识的一致或完全一致），而是为了追回一点笔者聆听大师亲自讲述自己思想的记忆，并结合笔者对大师著作的多年研读所得、以及笔者与大师在较长时间里的交流，抒发一点笔者的个人思想和体会，以作为对大师的纪念，同时权当笔者对以往未曾参与或回应各种议论的补遗。

### （一） 关于“翻译科学”

具体涉及两点：一是对这个问题奈达自己怎么看；二是我们应当怎么看。首先说明，“翻译科学”这个中文用词虽可作为原创中文术语来使用，可与“翻译学”一词互换，但笔者此处所用，是指译自奈达 1964、1969 上述两部相关著作和 1969 年相关论文(Nida, 1969: 483-497)中所说的“a science of translating”和“the science of translation”，主要指奈达思想中的“翻译科学”。有学者认为，奈达所谓“a/the science of translating/translation”不能译为“翻译科学”，而要译为“科学（地）谈论翻译”之类的文字，例如把书名 *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 从《翻译科学探索》改译为“翻译的科学探索”（即表示：对翻译的“科学的”探索），因为奈达不认为翻译是科学。而且，在一段时间里，相关学者对此种解释还十分执着，甚至拿出与奈达通讯交流的言语来支持自己的观点。

奈达的意思果真如此吗？或者说，他所说的从来都不是“翻译科学”，而只是“科学地”看待翻译吗？当然，笔者在这里无意怀疑相关学者所说奈达在其通讯交流中不赞同“翻译科学”说的真实性，事实上到了 1990 年代中期后，在与奈达的面对面交流中，笔者也同样了解到了他在相关思想上的一些变化，但笔者认为，对前面那样的问题，我们却不可用简单的方法来回答。如果用相关学者那种简单的论证方法来论证，显然是有

欠严谨的。暂且不说 *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 这个书名究竟是译为《翻译科学探索》好呢，还是应当改译为《翻译的科学探索》或《对翻译的科学的探索》（这在稍后再谈），先来看看奈达的原意到底是什么，看看他到底有没有认为过“翻译是科学”。

可从多个层面来阐述这个问题：先从与奈达本人第一手交流、也就是相关学者用以论证自己观点的层面来谈。笔者自 1979 第一次聆听奈达讲座起，至 2004 年与大师最后一次相见、相叙于罗马国际会议止，与奈达的面对面请益和交谈不下 10 次，然而至少在 1995 年之前的各个交流场合，其中包括奈达 1983 年到访北京外国语大学期间、特邀笔者北上听他在北外举办的第二次来华演讲，也包括 1985 年大师夫妇<sup>4</sup>访问南京大学和南京金陵神学院期间、特邀笔者同样入住大师夫妇下榻的金陵酒店，在听其演讲之余与他进行较深度的译学讨论，更包括大师数次到访笔者所在学校和在笔者寒舍的较长时间恳谈，笔者都曾多次与大师当面谈到他所提出的“翻译科学”说（the science of translation/translating），以及这一学说在当代翻译领域所产生的巨大影响等问题，而对所有这样的讨论和提法，大师都当即认受，认为翻译具有多面性，即是艺术、技术，也是科学，有时他还语带玩笑、且不无欣赏地告诉笔者：不少人甚至把他称作“father of the science of translation”（翻译科学之父）。如此说，即使是在与奈达本人第一手交流的层面，至少是在口头表述的层面，奈达也都明确说过“翻译是科学”，或同意“翻译即科学”的观点。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然而，在笔者看来，对所有这类与奈达就“翻译即科学”观点的口头或通讯表述，尽管毫无疑问都属于来自与他本人交流的第一手资料范围，却也只能算作对他基本思想的一种旁证。也就是说，对于奈达到底是不是、有没有认为翻译是科学或不是科学之类的问题，我们不能简单地凭与他的口头交流，更不能简单地凭与他晚年说的某句话，来对他的整个思想体系作出某种武断或断章取义的判定。笔者认为，正确的做法应为：一是以他在正式出版物中所发表思想和观点为评价主体，以非正式场合（包括口头或私人通讯）所发之言论为辅助资料；二是将所有言论（包括正式或非正式发表之言论）置于历史框架中，以辩证的、历史的眼光去看待他、判断他、评价他，即：他曾经怎么说，就评他曾经怎么说；后来他改变了，就评他后来转变了；而不可因为后来的他不像原来的他，就把原来的他一概改变成后来的他，或者用后来的他，不由分说地去打倒、否定掉原来的他。对于任何人（特别是名家或公众人物）的言论，一旦在公开场合发表，就会随即成为公众领域的财产，虽然谁都可以（包括言论者本人）对它进行更改、修正，甚至宣布放弃，但却永远都抹杀不掉它曾经被发表的历史事实。这一点，对于奈达在翻译是否为科学的思想表述上也是适用的。

---

<sup>4</sup> 这里是指奈达与他的第一任夫人奥尔西娅（Althea）。奥尔西娅于 1992 年去世，奈达于 1997 年再婚，第二任太太艾琳娜（Elena），是西班牙人，在比利时布鲁塞尔担任欧盟委员会翻译部门负责人。

那么，原来的奈达又究竟是怎样的呢？他在翻译是否为科学的问题上，究竟有何正式表述呢？按照以上所说，以正式出版物为准则的衡量标准，原来的奈达自然就存在于他最初赖以成名的著作和思想中，存在于主流评论界对他理论定性的正式评论中。

研究奈达翻译理论和思想的人都不难发现，奈达除了将“Science of Translating”（翻译科学）的标志性字眼植入其最主要的代表作，即1964年出版的那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译学著作中以外，还在1969年与塔伯（Charles Taber）合著的*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中说：“... translating is far more than a science. It is also a skill, and in the ultimate analysis fully satisfactory translation is always an art.”(Nida & Taber, 1969/1982: vii)（……翻译远远不止是科学。它还是技巧，而且归根结底，完全令人满意的翻译总是一门艺术）。在这段文字里，奈达虽然未直接说“翻译是科学”，但却明确说到“翻译远远不止是科学”，此话的内含前提无疑是：“翻译是科学”。只不过，它不止是科学，同时才有其它属性，即艺术和技术的属性。

此外，奈达在其他地方也使用了“science of translation”或“[translation as a] science”等说法，并无处不取“science”即“科学”之涵义。例如，他在本文参考文献 [7] 中所列 *Language*（《语言》）杂志1969年第45期发表的文章里，标题和正文都明确使用“(the) science of translation”的说法，并指出：“Translation is actually describable in terms of three functional levels: as a science, a skill, and an art” (Nida, 1969: 483)。另外早在1963年，奈达曾在 *Babel* 这份国际翻译学杂志的第9期发表过一篇题为 *Bible Translating and the Science of Linguistics*（圣经翻译与语言科学〔语言学科学〕）的文章，其中“the science [of linguistics]”（语言〔学〕科学）与他的“the science [of translation]”（翻译科学）应属同一提法，其中“science”一词就是指的作为“知识系统”的“科学”，而非某些学者所讲的相当于“scientific study [of translation]”（〔对于翻译的〕科学的研究）之中与“正确〔的〕”不无同义的“科学〔的〕”，也不等于“科学地谈翻译”中具有副词性质的“科学〔地〕”。

再者，正如后面讨论其如何翻译时还要触及到的，奈达书名 *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 中的“Science of Translating”或其变异形式“Science of Translation”，应当作为一个译学术语来看：它由名词词组构成，表示一个译学概念。而有关学者却提出，*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 是指“科学地谈翻译”，那么，其“科学地谈翻译”自然不会是术语。这样一来，它就成了一个“副词+动词+宾语”组成的无主句，表示事件。即是说，“翻译科学”（[a/the] science of translating/translation）是“话题”，“科学地谈翻译”则是“述词”。在逻辑意义上，“翻译科学”可以“科学地谈翻译”，即是说它的任务可以是、或可以包括“科学地谈翻译”，但两者并不等同。用功能语言学的术语来阐释，“翻译科学”是代表“学科领域”意义的“话题”，而“科学地谈翻译”只能是说明“翻译科学”任务所在的“述词”。如果我们必须像相关学者所坚持的那样，

把 “[a/the] science of translating”（翻译科学）翻译成“科学地谈翻译”，那么类似的其他术语，如 “[a/the] science of language” / “[a/the] science of linguistics” 就只能翻译成“科学地谈语言” / “科学地谈语言学”之类的形式，而不可译为“语言科学”或“语言学”。

事实上，奈达的上述“翻译科学”论，在西方语言学界和翻译理论界产生过很大影响。纽马克（Peter Newmark）受奈达影响，曾于1981年在 *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翻译探索》）一书中也对“翻译即科学”的观点进行过论述。纽马克认为：“[O]ne could distinguish art and science in translation”（翻译可以有艺术与科学之分），并说：“Translation is a science where there is one correct or one objectively superior rendering of a word, phrase, clause, etc., and an art where there are more than one equally (less than) adequate rendering”（Newmark, 1981/1988/2001: 136）（翻译中，当一个词、短语、句子等只有一种正确的或客观上优胜的译法时，翻译就是科学；而当存在多于一种同样（不那么）充足的译法时，翻译就是艺术）。也正因为奈达的最早提出，“翻译科学”后来也就成了基本相当于作为学科名称的“翻译研究”，并以此身分进入西方各种译学词典。例如，沙特尔沃思（Mark Shuttleworth）等人编纂的 *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翻译研究词典》）就收入了由奈达首先提出的这个词条。该词条为：

**Science of Translation** One of the several overlapping terms used to denote the discipline concerned with the systematic study of translation phenomena (see also Translation Theory 1, Traductology,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Translatology). However, while often broadly synonymous with these other designations, the term *science of translation* tends to contain a number of theoretical assumptions and methodological overtones which set it apart. An early use of the term can be found in Nida (1964), who suggests it as a counterbalance to the tendency to view translation exclusively as an art or a skill. ... the science of translation (Übersetzungswissenschaft or Translationswissenschaft in German) is typically characterized as being highly interdisciplinary in nature, as translation scholars draw on the insights and methodologies of such differing fields as linguistics, communication theory, cultural studies and psychology ... (Shuttleworth, Mark and Moira Cowie. 1997/2004: 148-149)

（**Science of Translation 翻译科学**：多个意义重叠的术语之一，用来指对翻译现象进行系统研究的学科（另见 Translation Theory〔翻译理论〕1、Traductology〔翻译学〕、Translation Studies〔翻译研究〕、Translatology〔翻译学〕）。尽管时常与其他几个术语名称大致同义，但翻译科学这个术语往往包含了区别于其他名称的许多理论上和方法上的含义。这个术语的早期使用可在奈达（Nida）（1964）书中找到。奈达提出这个术语，是为了抗衡那种只把翻译仅看作是艺术或技术的倾向。……翻译科学（德文 *Übersetzungswissenschaft* 或 *Translationswissenschaft*）的典型特征是高度的跨学科性质，因为翻译学者运用了语言学、交际理论、文化研究、心理学等不大相同的领域的知识和方法。）（谭载喜等，2005：202-203）

综上所述，奈达的所谓“a/the science of translation/translating”，至少在他最初提此说法时，正是指笔者一直以来解读和翻译的那样，即“翻译科学”，与“the art of translation”

（翻译艺术）等说法属于同一平面。故此，如还有人坚持要像前面提到的那样，认为将奈达书名 *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 译为《翻译科学探索》是错译，而要译为《对翻译的科学探索》或《科学地谈翻译》才正确，那么在笔者看来，那样做倒真正是进退失据，把本来正确的翻译变得又错又牵强，因为撇开那种建议译文对英语原意的曲解不说，单从所谓“（对翻译的）科学探索”反映出的构词法及其逻辑意义看，就足以说明它的偏误。在英语原文“*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中，“*toward*”是介词，表示“朝向”、“接近”等意思，笔者认为，奈达不取“*A Science of Translating*”或“*The Science of Translating*”为书名，而要在前面增加一个“*Toward*”，目的在于使作者对自己所要表述的思想不显得太过肯定，既留有余地，又含谦逊之意。因此，把它译作“探索”，自是较为恰当的。当然，采用其它译法也未尝不可，如“迈向（翻译科学）”或“接近/走近（翻译科学）”等，但就是不可将它省略不译，书名改变成“科学地谈翻译”；也不可把“*toward*”和核心名词“*science*”的逻辑关系颠倒过来，将“*science*”变成“*toward*”的修饰语，从而产生出“翻译的科学探索”（即：“翻译的科学性探索”）。

所有这些，都无一例外地指向一个事实，就是：无论奈达后来怎么说，特别是无论后来他在与个别人士的交谈或私人通讯中怎么说，他在其成名时期公开发表的主要著作或言论中，所表达的都是“翻译即科学”的观点，与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标志性术语“*the science of translation*”也无不表现出这一基本理念。研究和认识奈达翻译思想的正确方法，就是把奈达的言论置于相关著作和文章发表的当时，而不是置于他思想可能有所改变的后来，或把解读者的观点想当然地错配在奈达身上。

无可否认的是，研究和跟踪奈达翻译思想发展的人们会发现，自1990年代以来，奈达在“翻译即科学”的观点上的确发生了一些变化，主要表现形式在于，后来他基本上不在公开发表的文章、著作中再强调他早期所提“翻译即科学”的观点了。笔者曾在1999年编译出版的《新编奈达论翻译》一书中，根据奈达的思想变化指出，“奈达曾经提出‘翻译是科学’的主张，后来又基本放弃了这一主张。不管是提出还是放弃，他都没有提出充足的、令人信服的论证，这不能不说是一大缺陷”（谭载喜，1999：XXV）。

但话又说回来：对于翻译是不是科学，或是奈达说了还是没说翻译即科学的问题，其本身如今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应以怎么的态度，去对待奈达及其在各个不同发展阶段的所思所言，以及我们自己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如何阐释翻译的性质。笔者于1980年代初曾以“翻译是一门科学”为题，写过一篇介绍奈达“翻译即科学”观点的专文，刊于《翻译通讯》（《中国翻译》的前身）1982年第4期。该文当时局限于只介绍奈达的思想，虽然从文中应可清楚看到“翻译即科学”是奈达的思想，但由于文章并未特别阐述笔者本人是否认同奈达的主张，因而当后来笔者在《外国语》1988年第3期所发《试论翻译学》一文中说到，“翻译不是科学，翻译学才是科学，两个概念不可随意混淆”的问题时，有些学界同仁感到有点不好理解，认为笔者的观点怎么前后发生如此“巨

变”。这应该算是一个误会，因为笔者最初在介绍奈达时并未未把“翻译即科学”的观点说成是笔者的观点，而只是那篇文章的标题较为醒目，的确容易引起误会，笔者现特此做一点迟来的澄清。同时想说，我们各人所表述的观点，不论是说“翻译即科学”，还是说“翻译不是科学”，其实不过是一个观点而已。应当允许有各人的观点存在，或观点改变，最要紧或最要追求的，不是去斤斤计较于结果中的我是你非，而是去展开如何客观认识事物、合理而客观地展现自我观点的历程。

## （二） 关于“动态对等”

笔者在过去 30 多年的翻译教学生涯中，特别是在讲授有关奈达的翻译理论和思想时，“动态对等”是使用、讲授最多、最频密的一个词。而在如何理解奈达翻译思想中这个核心词的问题上，笔者的诠释一直以来都得到了所教学生的普遍认同和接受。笔者在此再就相关问题谈点个人看法，既是把笔者平时翻译课堂上的诠释内容说出来与更多人分享，也是再次以此就笔者对于大师翻译理论基本概念的认识来作一个检验。

或许大家已经注意到了，笔者在如何翻译“dynamic [equivalence/equivalent]”一词上，曾经有过一些变化。在 1982 年的最初评介文章里，用“动态〔对等〕”；到了 1984 年由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的编译本《奈达论翻译》，改用“灵活〔对等〕”；后来在 1999 年由该公司出版的《奈达论翻译》中，又改回到原先的“动态〔对等〕”以及根据奈达本人的改变，同时采用了“功能对等”（functional equivalence）”。然而，令人吊诡的是，虽然奈达本人坚持将“动态对等”改为“功能对等”，但翻译理论界（包括西方翻译理论界）每每引述或谈论奈达翻译思想时，提到的仍旧是他的“动态对等”说。这与前面所述如何看待奈达“翻译即科学”问题上的情况相比，不失有其异曲同工之趣。

为了与大众保持一致，笔者也就弃新恋旧，同样把“动态对等”说视为奈达的标志性翻译观之一，而把“功能对等”作为备份来谈。按照奈达的定义，所谓“dynamic”（动态），应与“static”（静态）一词相对，而“equivalence”（对等）者应从既非“identity”（同一）又非“correspondence”（相当；对应）的角度来理解。具体说来，“动态对等”的翻译，“是指从语义到语体，在接受语中用最切近的自然对等语再现源语信息”（Translating consists in reproducing in the receptor language the closest natural equivalent of the source-language message, first in terms of meaning and secondly in terms of style.）(Nida, Eugene A. ,Charles Taber. 1969/1982, 12)。在“动态对等”的翻译中，译者着眼于原文的意义和精神，而不拘泥于原文的语言结构，即：不追求使目标文本与源文本在形式上完全相同，而是为了使目标读者能更加清楚地理解原文的语境意义。之所以要采用这种译法，或许是因为，如果用形式上与源文本等同的目标文本，会使读者看不懂或产生误解；也可能是因为，源语文化中表述的现象，在目标文化中并不存在。奈达举“雪”这个自然现象为例：对于从未见过“雪”或不知道相关概念的人来说，他们可



能会有“白如羽绒”的说法，因此用“白如羽绒”来译“white as snow”（白如雪），使目标文本在语用意义和功能上达成了与源文本一致，目标读者也能正确理解，从而也就是达成了“动态对等”的翻译。

用较为通俗的话语来解释，所谓“动态对等”的翻译，其实就是指不用死板、而用灵活的方法，来产生在“语用意义”或“功能”上与原文保持一致的译文。从这个意义说，对于奈达所提“dynamic equivalence”一语的中文译名，笔者在1984年版《奈达论翻译》中使用的“灵活对等”译法，应该算是一种比“动态对等”译法更易于理解的、“动态对等”式译法。鉴于此，笔者不得不说明一点：笔者在后来之所以放弃“灵活对等”，而转用“动态对等”，主要是考虑到，后者的“术语性”和“当代性”似更优胜于前者。

在作出上述解释之后，笔者要特别强调，把“dynamic equivalence”翻译成“动态对等”，这个译法是“充足”的、恰当的。事实上，此译名早已成了包括内地、台湾、港澳以及新加坡等华语地区翻译界普遍接纳和使用的译名，《中国翻译词典》、《译学大辞典》、《译学词典》、《汉英双向翻译学语林》、*A Glossary of Translation Terms*等也都统统沿用此译。但笔者也要指出，至今却仍有一些学者一直耿耿于“动态对等”、或“动态”与“对等”等术语的使用。有人甚至认为，“dynamic equivalence”不能译成“动态对等”，而应译为“动力相当”或“动力相应”，因为大概“动态”不可取，而“对等”却是精确词，要100%对100%才是“对等”。虽然在译学术语的语境下，提出把“dynamic”译为“动力”，不免显得有些“离谱”或“滑稽；把“equivalence”一定要译为“相当”、“相应”，不免是没有理解奈达在“equivalence”（对等）、“identity”（同一；完全相同）与“correspondence”（相当；相应）这三个概念之间所作的区分<sup>5</sup>；也虽然坚持用“动力相当”或“动力相应”来取代“动态对等”译法的人并不多；但由于它涉及到究竟如何理解奈达原意和如何正确、恰当地中译外来译学术语的严肃问题，因此笔者认为对它作出上述讨论，或许并非没有意义。

### （三） 关于“读者反应”

如前所指，这是奈达翻译思想的第三核心概念之所在。当然，在奈达的各种原著里，“读者”（reader）一词的使用，往往让位于“〔接〕受者”（receptor）；“reader reaction”（读者反应）也往往让位于“receptor reaction”（〔接〕受者反应）。可见，多用“〔接〕受者”而少用“读者”，多用“〔接〕受语”（receptor language）或“〔接〕受语文本”（receptor text）而少用甚或不用“目标语”（target language）或“目标文本”（target text）这样的词语，这也是大师译学理论的另一特点，它折射出来的，是大师对“接受理论”

---

<sup>5</sup>如果有人至今仍认为“equivalence”不应中译为可做模糊解释的“对等”，而要泛译为“相当”、“相应”（或“对应”），那我们不妨反问：假如把中文的“对等”、“对应；相应”译为英文，不分别译为“equivalence”和“correspondence”，莫非要把它们统统变为“correspondence”？

的推崇和运用。记得笔者有一回向大师当面请益，为何他热衷用“receptor”一词。大师回答说，任何传播思想者，包括翻译者或演说者、教师等等，都一定要首先关注自己所言能否被传播对象接受，他当即拿“〔接〕受语文本”（receptor text）和“目标文本”（target text）作比较，开玩笑地说，译者的努力方向，“应当是产生一个可为人接受的文本”（... to produce a text that will be received），而“不是产生一个可被击中的目标”（... not to produce a text that will be hit as a target）。

但是，也不知何种缘故，中外翻译理论界在谈论奈达的相关思想时，多半会说奈达的“读者反应”论，而非“〔接〕受者反应”论。笔者考虑到，在这两者之间其实并不存在本质区别，为避免不必要的误解，也就只好“随波逐流”，一概使用“读者反应”之说了。

总括起来，笔者认同大师这种“读者反应”至上的理论，因为正如大师本人所坚持的，要评判译文质量的优劣，必须看接受者对译文的反应如何，同时必须把这种反应和原作读者或接受者对原文可能产生的反应进行对比，看两种反应是否基本一致。好比在市场调查，要测验公众对市场产品的反应：对某个产品，不管理论上认为它有多么好，也不管它陈列时显得多么美观，如果公众反应不好，那就不会被接受，除非生产厂家要的就是这种“不被接受”的反应。笔者曾在《新编奈达论翻译》一书的序言中指出过，翻译如果不考虑读者因素，不估计或测验读者的反应，就可能产生出对牛弹琴的译文。比如，给现代英文读者翻译四书五经，如果为了强调原文的古味，而在译文中采用古英语或中世纪英语，一般现代英语读者又怎么能够接受？再如，莎士比亚的作品脍炙人口，给英国读者带来了欢乐，如果这些给英国读者带来欢乐的作品译成中文，却给中国读者带来极大痛苦，那能说它是好的翻译吗？

当然，奈达在“读者反应”对等的问题上，主要聚焦点是目标文本的交际性和可懂性，因而其适用范围受到了限制。例如，在世俗文学作品或在圣经文学典故的翻译中，如果始终把目标文本的可懂性摆在第一位，势必导致在语言和措辞上对源文本的简化处理，甚至导致目标文本的非文学化。英国翻译理论家纽马克也这样批评过：“如果把圣经中那么多奈达认为读者不能理解的比喻统统删去，那么就会不可避免地引起意义的大量走失”（Newmark, 1977: 175）。

这些，难免是伴随在“读者反应论”中的局限，因为顾全了读者反应，有时难免不以牺牲某些原作特色作为代价，包括原作的修辞特色、风格特色、时代特色、乃至地域特色。但笔者认为，也不能因此而像奈达思想的某些批评者一样，在所谓“言必奈达”的年代过后，似乎随即走向另一极端，将“读者反应论”一概予以否定。

其实，自1980年代中期起，奈达本人也越来越多地意识到，“读者反应论”具有某些先天不足，意识到文学翻译不可不突出文学作品的文学特征，因此他开始不断修正

和完善过去的一些观点。例如，在 1986 年与瓦德（de Warrd）合著出版的 *From One Language to Another*（《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里，他不再全盘否定“形式对应”，而是认为翻译中不可随意打破原文的表达形式，为此他还特别增加了论述翻译修辞学内容。对于这些，批评者是无法、也不应该去否定的。

本来，某个翻译理论的提出，一般都会有其语境性、特殊性和针对性。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严复的“信达雅”、奈达的“读者反应论”、德国功能学派的所谓“翻译目的论”，概莫能外。反过来，任何好的理论，不管它有何语境性、特殊性或针对性，一般也都同时会有它的合理性、普适性和超时空性。具体到奈达的这个“读者反应论”，尽管它首先是针对圣经翻译，围绕特定读者群，在圣经话语传播的特殊语境下提出的，但它要求译文必须具备“可懂”、“可读”、“可接受”，能起语言文化沟通作用的部分，是合理的、具有普适意义和跨越时空限制的。即使是对于文学翻译，也不能说不是如此。

必须再三指出的是，当我们在肯定或赞扬奈达的理论时，我们需要意识到它可能存在的局限和不足，不要盲从；而当我们在批评它的局限或不足时，却又不能妄加指责，把那些本来合理、优胜的部分也否定掉。尤其是，有些人在后“言必称奈达”时期，常常对奈达的一些核心理论横加批评、甚者彻底否定，如对他的“动态对等论”和“读者反应论”，可是他们又不拿出、或拿不出可以用来替代的更好的理论。对此，大家是需要忌讳的。

### 三、再见大师 永释人格之光

能够与奈达相识与相知，既做他的学生又成为他的忘年之交，笔者感到十分荣幸。记得自 1979 年伦敦第一次听译学讲座，初次接触奈达，与他交谈并得到他鼓励后，由于学业紧张和未敢妄自打扰名人的缘故，那第一次建立的联络线并未即时向前延伸。直到 1983 年在笔者学成回国两年之后，笔者突然接到远方来信。令笔者不敢相信的是，发信人不是别人，是正被笔者作为研究对象的尤金·奈达。笔者从来信得悉，大师通过他的华人朋友关注到，笔者不久之前在中国的翻译杂志上发表了介绍他的文章（即前面所提《翻译通讯》1982 年第 4 期刊载的《翻译是一门科学》一文）。大师告诉笔者，他将于 1983 年第二次来华讲学，地点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当时叫北京外语学院）。（在此之前，大师曾于 1982 年已经到访过中国，是应邀在广外举办的暑期翻译理论讲习班讲课，但当时笔者与大师的联系仍是中断的。）大师在来信中说，如果我愿意，可去北京与他见面，并听他讲座。笔者收到大师这个意想不到的来信，激动之情自不待言。如是，当大师于当年 5 月如期而至时，笔者便怀着迫切的心情，从长沙飞到了北京。再次聆听到大师的声音，听到他对自己翻译思想的精湛诠释，笔者的兴奋感丝毫不减当年。所不同的是，如今的听众换成了几乎清一色的中国学子。笔者与奈达之间曾经中断了的连线，也自此再次开通，直至大师离去。

自 1982 年至 2000 年间，大师来过中国 13 次，应邀到 25 所中国大学进行过讲座。曾经包括 1991、1994、1995 年先后三次到访笔者当时所在的深圳大学，其中第一次为大师由台湾友人陪同专程来笔者家中探访，另两次为大师应邀来深大访问兼讲学，并再次家访笔者。1993 年，笔者第一次访美，去旧金山加州大学一个分校参加学术会议，会后兼程北上去纽约拜访大师。大师十分关心学生访美的行程安排，担心学生访美期间可能经费受限，见面时坚持递给学生数十美元作为乘车之用，令笔者很是感动。在 1985 年那次大师夫妇访问南京大学和南京金陵神学院期间，大师特邀笔者入住他们下榻的金陵酒店，入住两天的食宿费用均全额由大师提供。笔者在听完大师演讲之余，与大师进行了较长时间讨论，还曾共同拟就了合作编写一本译学著作的计划。虽然后因各自工作实在太忙，而未能如愿完成书稿，使此事终为憾事，然而，在与大师倾谈、向他请益的整个过程中，笔者对大师那一贯关怀晚辈、热情无私地提携后学，以及在学术讨论中表现出的那种不高高在上、不强加思想、与任何人（包括晚辈）始终都保持学术平等的言与行，一次又一次地感动了笔者。

笔者后来与大师的几次再见面，分别发生在 1997 年的香港、2001 年的纽约和 2004 年的罗马。1997 年下半年，奈达携同他新婚的第二任太太艾琳娜应邀来香港城市大学讲学，笔者当时正在城大担任研究和教学工作，于是接待了大师夫妇，并应讲座组织者邀请，担任大师是次演讲的介绍嘉宾。2001 年，在纽约举办了一个大型国际翻译学术会议，会议期间，以奈达名字命名的奈达圣经学术研究所(Nida Institute for Biblical Scholarship)举行命名仪式，笔者应邀以大师的学生身份、唯一的华人与会代表在仪式上致辞。同年，在香港举行的亚洲翻译论坛上，香港翻译协会颁授该会荣誉研究院士证书给奈达（当时大师本人因故未能到场，证书由友人代领），笔者应邀在颁授典礼上宣读给大师的赞颂辞。2004 年，笔者应奈达圣经学术研究所邀请，担任该研究所于当年在罗马举办的大型国际翻译学术大会的组织者之一，会议期间再次与奈达夫妇见面并倾谈。

所有这些使笔者接近大师、或把笔者与大师联系在一起的机会，都使笔者感到无上荣幸，使笔者有着无比美好的回忆。然而，令笔者荣幸之至、带给笔者美好回忆的，远远不止是接近大师、亲历与大师交流的机会本身，而是从大师身上看到、学到的为学和为人之道。大师毕生勤于治学、亲善为人，在笔者和他人的眼中，他是一个名人、伟人，但走近他身边，却发现他始终是那么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从而更令人对他油然而敬。

大师离去了，然而，他的人格魅力、学术思想是长存的，他的影响是恒久的。

2011 年 10 月于香港沙田骏景园

#### 参考文献：

- [1]黄锡木（编译）. 文以载道——奈达对圣经翻译的贡献[M]. 香港：道风书社，2007.
- [2]谭载喜(编译) . 新编奈达论翻译[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9/2001.

- [3]谭载喜（主译）. 翻译研究词典[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
- [4]NEWMARK, P. Communicative and Semantic Translation [J]. Babel, 1977(23/4).
- [5] NIDA, E A. 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 [M]. Shanghai: The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1964/2004.
- [6] NIDA, E A.,TABER C.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Leiden, the Netherlands: E. J. Brill., 1969/1982.
- [7]NIDA, E A. Science of Translation [M]. Language 45. 1969.
- [8]SHUTTLEWORTH, M,COWIE M. 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2004.

谭载喜

香港浸会大学

thtan@hkbu.edu.hk